

漫谈理论如何联系实际

曉 文 著

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漫談理論如何联系实际

曉 文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57年·哈尔滨

目 录

我們的基本原則.....	1
歷史的丰富經驗.....	8
过社会主义“关”.....	21
路途長，逐步走.....	46
沒有輕易的道路.....	51
可以有不同的起点.....	57
有沒有什么竅門.....	67
最好的一种联系方式.....	74

我們的基本原則

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是我們的一條基本原則。不論是對待學習、處理一切工作或解決任何問題，無一不要遵守這條原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們總是遵循着這條原則辦事，並再三再四地教導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原則。中國共產黨一向忠实地以這條原則作為自己一切活動的最高的指導思想。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毛澤東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的這一句話，概括地總結出了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且看，在“八大”前15年的時候，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堅決主張改變當時甚為流行的一種極壞的作風，即“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作風。他號召全黨：摒棄那種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和“想當然”而在那里發號施令的主觀主義態度；摒棄那種無的放矢，不實事求是，沒有科學態度，只知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教條主義態度。他當時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他要求全黨同志用正確的态度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即領會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体的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体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中共中央于同年（1941年）12月根据毛澤东同志上述报告的精神，發布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就指出：当时在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缺点，就是理論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脫節。也就是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嚴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領会其实質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國环境。該項決議說：“为了糾正这种毛病，必須強調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確地应用这种理論去解决中國革命的实际問題，而不是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与背誦。”又說：“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確地教授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之外，同时必須增加中國歷史与中國情况及党的歷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論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來。”

可見，我們党是如何重視、如何努力为实现这个基本原則而進行斗争。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根据毛澤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这些指示，于1942年進行了偉大的整風运动。这次整風运动，不論就其規模和其深远的影响來講，都是最偉大的一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运动。它使我們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組織上更加統一和团結一致了，保證了党領導的抗日战争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当时在党内、在延安、在各个根据地甚为流行的一些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坏作风得到了克服，正確地对待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态度在全党更为深入和普遍了。毫不夸大地說，这次整風运动不僅是直接为成功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会准备了思想基礎，也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勝利以及全國勝利后取得各項工作的成就准备了思想基礎。

那么，这是否可以了解为在这以前，在1942年整風运动以前，或是說在1941年以前，我們党就完全違背理論联系实际这

条基本原则了呢？就没有这条原则了呢？不是的，这样了解是錯誤的。从基本方面講，我們党一开始就遵循着这条原则。我們党是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謀求独立和解放的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党，她的主張、綱領、政策和一切言行，在最基本的方面，都是貫徹着理論和实际相联系的原则。也就是說，我們党的这一切，都是适合中國國情的。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一开头就說：“中國共產党的20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20年。”毛澤东同志更在1942年的“整頓党的作風”报告中說：“这些作風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样，滿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从防空洞里跑出來的。”所以，当时的整風运动，是要把產生这种歪風的洞塞死。当时用了全党的力量做了一次这种塞洞的工作。这种塞洞工作，我們党过去做过，現在和今后也还要做，为的是要更好地实现理論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

我們知道，共產党是現代社会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她的思想、理論是代表着現今世界上的一切進步运动的前進方向。这是由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所規定的。因而我們党的思想、理論，不可能不忠实地反映世界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之所以称得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因为它是科学地总结了現代革命运动的最基本的实际經驗，就因为它符合現代社会前進运动的趋向，符合人类歷史發展的潮流。正因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与当今國際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着，与当今各國的一切進步的社会运动血肉相关，所以它总是生气勃勃、无往而不勝利。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知多少次地宣称，他們駁倒了馬克思主义理論，但倒霉的是他們每作这样狂吠的时候，接着听到的却是

馬克思主義獲得更大勝利的凱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際相聯繫，是工人階級革命政黨所固有的基本特徵。

歷史上一切革命階級和革命政黨，當其還在履行推動社會前進的角色的任務的時候，它們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也還基本上反映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不完全是思想、理論與客觀實際相脫離的。只有一切反动階級或反动集團，現代甘願充當資本主義的奴僕的人們，他們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理論和實際才是完全脫離的。因為他們不敢面對真理，不敢面對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不敢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他們在看待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方面，害怕真理就像老鼠怕見陽光一樣，因而他們就只得拿出些不着邊際的“理論”，甚至求助於一切謊言和迷信，來欺騙人民大眾。

創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大師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們，都是把偉大的理論力量與廣泛的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相結合的革命思想與革命行為的真正的巨人，他們的全部活動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的原則的活生生的體現。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總是教導我們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將理論誘到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現象，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和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二卷，莫斯科版，403頁）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是在概括各門科學領域中和社會實踐中的新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地發展與豐富起來的。列寧說：“我們並不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為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為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愿意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莫斯科版，105頁）

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在30多年特別是在遵義會議後的20多年來的鬥爭中，從各方面把這門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向前推進了。如像：用和平改造的方法，來消滅中國社會最後的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分子的絕大多數，通過教育改造而逐步地變成勞動人民的一個部分；用發動群眾鬥爭和專門的公安機關相配合的方法，來解決肅清反革命分子的任务；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來對待黨內某些犯錯誤的同志，和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以及某些持有不同見解的糾紛；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來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化藝術和科學；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來求得同贊成社會主義的各個民主黨派和一切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方法，來解決黨對領導機關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來解決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繫的任务。凡此等等，無疑的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新的貢獻，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的新發展。

每一個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勞動者，應該深刻地懂得，先進的思想、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對於我們的實際革命鬥爭該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先進理論的強有力的地方，就在於它使我們能判明局勢，能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繫，能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能察知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能察知事變在將來會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所以，如果我們不努力學習和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不能實現先進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領導的作用。當然，這種學習，應該是像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所指示的那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實質，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和解決我們革命工作中的實際問題，而不應該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的學習，不能只知道背誦書本上的

某些詞句和条文，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是直接違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

毛澤东同志在“整頓党的作風”报告中，批判了理論不联系实际和实际脫离理論指導的兩種傾向。具有前一种錯誤傾向的人，只以会背誦馬克思列寧主义著作中的若干詞句、条文为滿足，以为知道了这些就是懂得了理論；具有后一种錯誤傾向的人，只以自己的局部的实际工作經驗为滿足，而不懂得自己缺乏理論的和普遍的知識的危險性。所以这两种傾向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表现，而不論那一种主观主义，都是与馬克思列寧主义不相容的，都是与党的基本思想原則——理論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則——不相容的。

我們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毛病，歷年來在党的思想、政策的不断教育之下，在各种实际革命斗争的鍛煉过程中，特别是經過1942年整風运动之后，是逐漸地被克服、逐漸地減少了。也就是說，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党内已經不存在任何主观主义傾向了，我們已經用不着同主观主义的毛病進行斗争了，理論联系实际的要求已經完全做到了。不是的，还不能这样說。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主观主义的錯誤在目前我們許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嚴重地存在着。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努力來提高我們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水平。他指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來解决这个任务：

“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級干部的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习，使他們善于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問題，提高自己在复雜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經驗，在經驗中找出具体事物的規律性。第二，必須加强在广大的新黨員中理論和实

际統一的教育，使他們逐步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獲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黨的歷史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現狀的基本知識，認識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危害，而在知識分子新黨員中，則要特別着重認識教條主義的危害。第三，必須加強黨的理論工作。我們應當迅速集中必要的黨內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工作力量，從事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和基本經驗的研究，從事當前國際問題的研究，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以及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密切關係的科學部門的研究，使這一系列研究適合於當前黨的實際工作的迫切需要，適合於向廣大黨員和廣大青年進行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迫切需要。”這就是說：不論是在高級干部的學習中，在對一般黨員進行教育中，或是從事專門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都要進一步地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任務。

由以上所述，可見我們黨不論在任何時期，都是忠實於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這一基本原則的，既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反對經驗主義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以我們黨才能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不斷地前進。從最近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情況看來，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乘我們在進一步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任務的時候，却在反教條主義的幌子下大肆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說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密切地結合中國的實際，他們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錯誤的東西；我們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掉教條主義，他們要用資本主義來反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些青年知識分子盲目輕信右派分子的謬論，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大吃得開了，竟有的人連政治課也不願學習。這種情況說明：更好地結合實際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徹底改造我們的思想，牢固

地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乃是一項迫切而重大的思想工作。資產階級右派的陰謀已肯定地失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反擊右派的鬥爭中，也同在与任何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的情形一樣，永遠是百戰百勝的武器。這場偉大的鬥爭，是現代歷史上罕見的一次活躍而巨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運動。通過這場鬥爭，我們在理論聯系實際方面更前進了。

歷史的豐富經驗

把理論與實際密切地聯繫起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互結合起來，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需要經過不斷的實踐和鬥爭，需要我們不斷地善於學習。

中國人民在沒有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革命真理以前，當然是沒有什麼救國救民的良好方法，革命總是免不了遭受失敗；而在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之後，不善於應用，不善於把它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革命也仍然難免遭受挫折和失敗。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現代革命歷史上，是有過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的。

1927年蓬勃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之所以遭受了失敗，除因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背信棄義地實行叛變，和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之外，還因為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革命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約有半年時間），離開了黨的正確的革命路線，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他黨內同志的正確意見。這條右傾路線當然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大大地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以致黨員幹部和廣大革命

群众在革命的緊急关头失去方向，不能在当國民黨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襲击的时候組織有效的抵抗，使得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失敗之后，我們党而且只有我們党坚决勇敢地從地下爬起來，擦干淨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屍首，繼續領導着人民，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又進行斗争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27年秋至1928年初)，革命的領導机关又被“左”傾盲动路綫取得了統治地位。这是由于受到当时对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憤怒，而加强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的影响的緣故。反映这种小資產階級急性病情緒的盲动路綫的錯誤，就是不承認当时的革命运动在遭受了失敗之后而暫時处于低潮，不承認在当时情况下有正確組織退却，借以有計劃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之必要。顯然，这是主觀与客觀不符，理論与实际脫節的表現。

在糾正了第一次“左”傾盲动路綫之后，在第二次國內战争的十年期間，我們党在領導中國革命斗争上还犯过兩次“左”傾路綫的錯誤，这就是李立三路綫和王明路綫。李立三路綫發生在1930年夏秋之际（它占統治地位不到四个月），当时國內軍閥战争的局面擴大了、加剧了，人民革命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紅軍得到初步的壯大，在反动統治区域里的革命工作有了初步的恢复。于是，李立三等同志便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大干”（武裝起义）的条件已經具备了，号召組織全國規模的总暴动。这种“左”傾路綫顯然与当时中國革命發展的真實情况不符，它无视当时中國革命运动实际存在着的不平衡性（南方与北方、城市与鄉村），也无视中國革命需要我們在農村里去建立根据地和積蓄力量以推动全國革命高潮之到來的長期性。这顯然是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与中國革命实际相分离的錯誤做法，这样也就不能不使党和革命的力量遭受損失。

当时領導着紅軍和根据地的建設的毛澤东同志和其他同志，不但一开始就不贊成李立三路綫，而且以極大的耐心糾正了傳播到紅軍中和根据地里來的一些“左”傾錯誤，使紅軍和根据地还得到了發展，从而使李立三路綫比較快地得到糾正。

至于第三次“左”傾路綫——王明路綫，其形态比以前的兩次“左”傾路綫更为完备，在革命領導机关里占統治地位的时间也特別長（四年），給党和革命招致的損失更大。自然，它离开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指導思想也就更远了。

1931年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一部分沒有实际革命斗争經驗的同志，在作为李立三路綫的一些主要特征已被党中央糾正和停止之后，又在“反对立三路綫”“反对調和路綫”的借口下，以一种比李立三路綫更为“左”傾的觀點、更为強烈的宗派主义情緒，進行反对党的領導的斗争。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这条新的“左”傾路綫在中央領導机关內取得了勝利，开始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期間“左”傾路綫对革命領導工作的第三次統治。直到1935年1月遵义會議上才得以糾正和結束这条錯誤路綫。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主張正確路綫的同志們，是同这条“左”傾路綫完全对立的。遵义會議之所以是在我們党的歷史上实行了一次最有意义的轉变，就因为毛澤东同志的正確路綫——將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与中國革命实践相結合的路綫，被全党認識和接受，并开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領導。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左”傾机会主义者，总是打着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旗号，而他們所实行的却不是什麼馬克思列寧主义，只是他們自己的教条主义。且看：歷次“左”傾路綫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綫——王明路綫，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階級关系問題上，犯了理

論脫離实际的教条主义的錯誤。当时中國革命的实际情况是：農民的土地斗争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敗，土地革命就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毛澤东同志說：“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争的發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08頁）“左”傾路綫的代表者不了解这些，低估了農民斗争的决定性的作用，錯誤地反对所謂“農民特殊革命性”“農民的資本主义”。实行了許多超过民主主义革命階段的所謂“階級政策”。同时，他們也无視要求民主和要求抗日反帝的階級和階層的广泛性和積極性，否認中間营壘和第三派力量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对富農。这样，他們就主觀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階段，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顯然，这条“左”傾路綫，是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党的領導远落于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的錯誤路綫。

歷次“左”傾路綫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綫，对于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問題，也是作了非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解。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对武裝的反革命，这是中國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澤东同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的初期即已正確地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不發達的大國，武裝斗争和以農民为主的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因而在反动統治力量較薄弱的農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它可以成为全國勝利的出發点。从这个符合当时中國革命的客觀实际情况的基本观点出發，我們党就應該以鄉村为主，以城市为輔，革命在鄉村采取進攻和在城市里則一般采取防禦。可是“左”傾路綫的代表者則不了解这些，低估了農民游击战争和鄉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們总幻想城市工人斗

爭能冲破敌人的高压而突然勃兴，总是要求鄉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并以錯誤的城市工作观点來指導紅軍和根据地的各項工作。結果是城市工作失敗了，鄉村工作的絕大部分也失敗了。

“左”傾路綫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綫，在進攻和防禦的策略指導上，也犯了理論脫离实际的錯誤。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后，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國範圍內已形成敌强我弱的形势。这一基本的实际情况，毛澤东同志早就指出來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確的策略指導，應該是正確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对比，正確地判断运动的來潮和退潮，正確地利用敌人陣营里的每一个隙縫，善于給自己找尋同盟者。因而就應該区别敌人的强弱之不同，区别敌人内部的暫時穩定局面和不断分裂局面之不同，而决定我們的進攻和防禦，以便各个击破。不能一直進攻，不能打无勝利把握的仗。可是，“左”傾路綫的代表者則不了解这些。他們总是把包圍着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寫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狀”，所以总是一味盲目地实行所謂“進攻路綫”。在反动統治区域的工作方面，拒絕实行必要的防禦和退却的步驟，拒絕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性，而繼續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許的進攻的形式，使所發動的一些斗争行动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的参加和支持。这样，也就使革命組織更容易被敌人破獲。

在軍隊建設和作戰的問題上，“左”傾路綫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綫，也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义，違反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的。毛澤东同志根据当时中國革命以軍事斗争为主要形式的特点，規定兩条基本的軍事原則。第一，我們的軍隊必須是服从于无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战争必須在承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从第一条原則出發，就

是紅軍不只是要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軍隊內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自覺的軍事紀律。從第二條原則出發，就是紅軍在當時應以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為主要的戰爭形式。因此應該堅持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以及以多勝少、各個擊破敵人等作戰原則。而“左”傾路線則與此相反，把紅軍三大任務縮小為單純打仗一項，在作戰上要求“正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實則，“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完全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的實際，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這是政治路線上的冒險主義，推行之於軍事和戰爭上的必然結果。

“左”傾機會主義在組織路線上，就是實行了脫離黨內外群眾的宗派主義，在黨內外都是主張“打倒一切”。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對外拒絕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黨內為貫徹其意旨起見，曾經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一律錯誤地加以“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這與毛澤東同志的團結全黨、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密切聯繫群眾、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等等思想完全相對立。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錯誤的肅反政策和幹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混雜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使革命力量極大的削弱了。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如果不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就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就是指這段時期的情況講的。

“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這一切錯誤，其思想根源就是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不是主張理論與實際聯繫，而是主張理論與實際隔離。他們拋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原則搬運到中國來當作教條，不分析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們有時候也“估計形勢”，其方

法仍然是主觀主義的，就是把對於他們的觀點有利的某些個別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誇大為大量的、嚴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質的東西，而對於不合他們的觀點的一切實際（如敵人的強大和暫時勝利，我們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群眾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部存在着的矛盾，中間派的進步一方面，等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

當然，“左”傾錯誤的發生，同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極為廣大的社會條件有關。由於歷史原因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不能有自己的強大的政黨，因而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占了大多數。故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是不足奇怪的。同時，也因為當時我們黨內的廣大黨員和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還不夠高，對辨別是非、辨別正確的東西與錯誤的東西的能力還不夠高。像劉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所說的，“從我們黨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的經驗多少和黨的領導人選對於黨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關係，但是關係更重要的，是各個時期廣大黨員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是否善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總結鬥爭中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考驗黨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標誌。”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提供了我們理解理論如何聯繫實際的非常豐富的經驗。如果我們再從國際革命方面、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從最近一個時期的國際政治事變方面來考察一下，這種經驗也是豐富的。

在觀察現代一切國際問題的時候，必須首先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出發，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這是因為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權都操縱在一小撮大資產階級或壟斷資本家手里，它只能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